

年轻作家的原生态

熊召政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因此,在这个年代所诞生的许多文学作品也是浮躁的。浮躁是文学的致命伤。而在许多人的观念里,80后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浮躁的代名词。他们叛逆、喧嚣、不甘寂寞,因此,许多人直言不讳地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我当然不同意8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一说法。事实上,没有哪一代人是垮掉的一代,只不过每一代的生活方式以及追求的目标不同而已。但我所疑虑的是,在娱乐时代降临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大地的时候,在魔幻类小说风靡的今天,到底是年轻作家们抛弃了纯文学,还是纯文学抛弃了他们。

正在文坛上围绕80后作家的写作展开讨论并产生激烈争论的时候,我认识了徐光木,他也是一位80后作家,看上去他有些腼腆,尽管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显得少年老成,但笑起来仍觉得朴实,甚至有点稚气。他将他最近写的长篇小说《宿命》拿给我看,初看几页,我立刻被吸引住了,禁不住要一口气读完它。

《宿命》这部小说与目前文学网

站和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小说,尤其是新生代作者们的小说截然不同,它没

有追随大流,而是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写普通人、这平常事、关注人性。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有着农村生活背景的年轻人,都能够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激起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取材于现实生活,原汁原味,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

徐光木不追求年轻人偏好的华丽与怪诞的文风,这部作品写得自然朴实,以一种独特的浪漫主义手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层次的艺术描述,运用朴素而不干涩的文字来解读人性,凸显了改革开放后乡村生活的风貌和乡土人物特有的神韵。我曾说过,中国长篇小说讲故事的功能在退化,冗长的叙述和枯燥的概念正在阉割小说的鲜活与紧凑。但《宿命》却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引人入胜。

但作品的最为引人之处并不在于情节的精巧布局和语言的生动流畅,而在于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认识态

度,它通过深邃的生命意识和存在意识的阐述,热情地宣扬了生命形式的奇妙,寄寓着“美”与“爱”的美学理想,因而是一部展现人性纷繁复杂的人回味的作品。

也正是由于以上几种因素的合力,才使得《宿命》成为受百万读者热捧的网络热门小说,我想,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注意到,众多媒体也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极大关注,但媒体的报道仅仅局限于“80后关注农村题材”,“农村题材为何受网友追捧”等方面。我觉得《宿命》值得关注的不止于此。最为关键的是作者用传统的手法,写出了一部纯文学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部作品昭示出80后新生代作家文学心态的回归,因而对于传统文学的传承大有裨益。

当然,这部小说与优秀文学作品还存在着一些差距,立意虽然不错,但在表达方式上仍显得不够成熟、老练。正因为这样,它才展现出年轻作家文学的原生态。从激情写作过渡到心灵写作,这需要经历长久的人生和风霜的洗礼。徐光木这么年轻,显然还不能心清如水,更不能洞若观火。

2007年11月7日晨



茶可道

在我心目中,明末清初的张岱是天下第一等趣人、妙人、韵人,又是第一等痴人。生为世代仕宦的子弟,家中藏书甚丰,锦衣玉食,兴趣极广。明亡之后,披发入山,安贫修德之余,偏偏不能忘情旧日,写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如小品版的《红楼梦》,写尽了繁华如花流水如梦,也写尽了落花满地好梦成空。他是反现实主义,国破家亡之后坚持“梦中说梦”,用完美的记忆来代替残酷的现实,所谓“余梦中多有,反为西湖所无”,“惟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

只有如此痴人,才会堂堂正正地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我无比信服这句话,从来“把它读成了心里话”(陈鹏举评李商隐语)。按此标准,张岱自己,绝对是那个时代最值得与之来往的人,他不但有“癖”,而且非止一端。寻常人病在“无深情”,他病在情“滥”无法自制,情深不能自拔。他恋园艺,精戏曲,好美食,嗜佳茗,耽于湖光山色,月夜、琴棋书画、古董古玩……像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中所说“纨绔子弟,极爱繁华”,他确实热爱繁华——生活中所有与“实用”无关而和“享受”有关的事物。

有这样广阔而深厚的底子,张岱在茶艺方面的造诣自然不同凡响。他与茶有关的文字,最著名的可能是《闵老子茶》。其次是《兰雪茶》,再次是《榷泉》。《闵老子茶》写张岱寻访茶人闵汶水。1638年九月的一天,41岁的张岱慕名专程去拜访老茶人闵汶水,说:“今天不畅谈闵老茶,绝不回去。”闵很高兴,亲自当炉烹茶,张岱品后叫绝,问是哪里的茶?闵说是阊苑茶。张岱说:别骗我!是阊苑的制法,而味道不像。闵笑着

问:那你说是哪里产的?张岱再啜了一口说:“怎么这么像罗芥?”闵不禁吐舌称奇。张岱问是什么水,闵答是惠泉。张岱又说:别骗我!惠泉在千里之外,怎么能这样鲜爽不损?闵不得不说出取惠泉的秘诀,又吐舌称奇。闵又拿来一壶茶斟给张岱,张岱说:这个茶香烈味厚,是春茶吧。刚才喝的是秋茶。闵大笑说:我活了70岁,见到精于鉴赏茶水的,没人比得上你!两人从此结为忘年好友。这篇文章写茶写人都惟妙惟肖,许多文章名家提及,往往不吝篇幅地全文照录一遍,在我看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不自禁。

在《榷泉》中,张岱写了他重新发现榷泉的过程,郑重有如历史性大事件。他还提供了辨别的方法:取水入口,先后抬起舌头、舔过上颚,过颊即空,好像没有水可下咽的,就是榷泉。他说来似乎既明确又简单,但是一般人恐怕只有吐舌称奇的份。张岱这种连老茶人都惊叹不已的鉴赏力,他自己却觉得很平常,说是“诸水到口,确实易辨”——各种水一进口就知道了,实在很容易分辨。对他来说,想分辨不出来都难。

不过,被老天赐予或者后天渐渐培养出这样的嘴和舌头,也不全是好事。因为有了这样一张嘴,生涯中就少了许多从众的乐趣,天下多了许多进不了口的东西。别人觉得好,你觉得只是凑合;别人喝得,你根本喝不得。张岱对被老天选中成为这种人没有一个字的抱怨,但是他的一个朋友和他厮混久了,不知不觉中嘴被养刁了,分别后大叫其苦:家里的水实在进不了口,张岱,你还我原来的嘴来!

无端地觉得,像张岱那样的人,繁华热闹、任性胡来都只是外表,内里是极干净的,五脏六腑都是香的。

想见其人肺腑香

茶人之九(上)

潘向黎

百年沈宝基

何振华

沈宝基先生1908年4月出生于浙江平湖,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去年春我到湖南作“三农”问题调研,在长沙的时候,报社朋友问我想见见谁,我说就想去铁道学院看望沈宝基先生,只是老人年事太高,又是重听,不忍心搅扰。友人说沈先生不在了,已病故于北京。

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乃至文学“圈”中人,知道沈宝基这个名字的,恐怕无几。尽管沈宝基翻译的《罗丹艺术论》当年也是畅销书。有一次在施蛰存先生寓所,施老说,是沈宝基将萧三所译《国际歌》歌词中的“罪人”改译为“受苦的人”,这样更贴近原意,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被誉为“重大贡献”。1994年5月,沈先生寄给我两册他的诗集油印本《第五季及其他》和《历代杂咏》。内中附有研究沈诗和译者的论文及评语的目录,也收入了我的两篇文章。我当时见了真是脸红。我对诗歌理论没有研究,最早对沈先生的所谓“熟悉”,也并非因他与戴望舒、李金发同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先祖,而是钦佩于他译介法国文学的了不起的贡献。

我原先蜗居在贴隔壁的亭子间,住着个老太太,就在弄口摆个香烟茶水摊,平时衣着陈旧而洁净,得体,一头雪白的短发始终梳理得整整齐齐。我从没见过她脸上泛出过笑意,一贯冷峻的目光里,读不到丝毫的感激或阿谀。记得有一趟她说剪几双鞋样,问我要一些过期的旧报纸,我送报纸给她时,她扫视了几张版面的标题,摘下老花镜问我:“这个凌叔华,你晓得么?”我点点头,她便自顾自做事了,似乎我这个人不存在。之后没几天,老太太颤巍巍摸上我的小阁楼,递给我一双簇新的蚌壳棉鞋,脸色依然严肃地对我说:“一个人不懂得爱惜自己,老是这样坐着看书,血脉不和。寒从脚底起。”我谢字还没出口,她已转身下楼,这双棉鞋我一直舍不得穿,不知她是何以“量”得我的鞋码的。老太太出身北平一书门第,幼年丧母,与兄长随父到上海,考入法国办的“震旦”哲学院。“文革”中任医学院院长的丈夫跳楼自尽,独苗女儿决意“划清界线”,将她“扫地出门”,被好心邻居接进腾出的亭子间,一住就是20年,先是帮人编结绒线衫或拆纱头、糊纸盒,再后来在弄堂口摆了个烟杂摊,直到80岁脑溢血去世。我迁居之后写过一篇随笔提及老太太,沈先生从杂志上看到后给我来信,说“读了很感动,特别是那位老太太的形象让我暗流流泪;你的文笔是成功的。”1992年夏天我往“藤竹斋”拜访病中的沈先生时,他又提到了那位老太太,说自己是14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当时从中法大学毕业获公费留学法国里昂。闻之我心情格外沉重,没想到自己的一篇文章,触动了沈先生的伤感情绪——“文革”中,沈先生被遣送老家,生活无着,妻子精神失常。

“一个朋友多半登鬼录/你居然还健在/居然还在舞弄笔墨/像是有许多话要说似的/不管这些话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人听……”这是沈宝基先生用苍劲的左笔书赠我的《致施老蛰存》诗。老人的听觉已远离尘嚣,我当年也是像每次面对施老的时候一样,拿一张张纸来向沈先生提问。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沈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低吟,“人生的尽头依然不见/在一个灯红的晚上/已经实现/而即失去的理想”。百年沈宝基,诗没有死,人还活着。

苏州画院院长、吴门才俊周矩敏的人物画不蹈恒蹊,自出机杼,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品质,在当代人物画坛别树一帜。

周矩敏将自己比作酿酒师,在中国文化的酒坛里不断加料,宋代风俗画、减笔画的表现手法,明清陈老莲、金冬心的造型线条,丰子恺《护生画集》的人世观念,借鉴民间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审美取向……他择善而用,进而创立新腔。他信奉“四不”理念:不盲从大师名家,不迷信金科玉律,不拾人牙慧,不重复自己。将创作的重点定位在民国时期的人物画题材上,着力描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州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近年来,他创作的《姑苏情韵·百俗图》《散淡人生系列》《漫游三十年代的海》等作品,演奏了一曲曲饱含



周矩敏

苦辣酸甜、记录岁月沧桑、反映民众心声的动人乐章,给当代画坛吹来一股清新、质朴之风,拓宽了水墨人物画的创作领域。

周矩敏涉猎工艺美术、室内设计、中国画、漆画、壁画、版画、连环画等,且都取得不俗成绩。进入新世纪,年过半百的周矩敏舍弃驾轻就熟的画路,将艺术的触角伸向鲜为人涉足、关注的领域,在求脱这变中实践自己的审美理念。其描绘对象多为民国年间苏州的诗人、书家、画家、教师、绅士、商人、文物商、园艺师、民间艺人。在特定的生活圈子里,他们闲暇之余,相邀结伴游园观景、吟诗作画、听书看戏、养鸟种花、品茶聊天,渴求平静、安宁的生活。这种带有小资情调的生存状态一旦因外侮、战乱、灾害诸多因素而失去平衡、打碎梦想时,便会同仇敌忾,投身到“反独裁,争自由”的洪流中去,他的巨作《风云》等作品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

从1963年,我研制成功中国第一盏高亮度的高压汞灯至今,已经有40多年了,40多年的岁月把我变成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头,一个绝对应该在家里享清福的老头!但是我对新光源研究仍然兴趣盎然,就在不久前,我还支持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争得了电光源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2007年第十一届国际光源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权。

很多人也许不能理解:这么大的年龄还这么有劲地搞研究图个啥?实在地说,什么也不图,只因为科技创新让我活得有滋味、有价值。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直至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没有自主研发的新光源,更谈不上新光源研究。正是看到这个让人窘迫的状况,我们从事光源研究的人感到很不安,感到自己责任重大。

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的我,带领一个电光源研究小组开展了新型光源的系列研究,在吃了很多苦后,终于研制成我国第一只高压汞灯,到1965年,又先后研制成功碘钨灯、长弧氙灯、超高压球形氙灯、超高压汞灯、空心阴极灯、氢弧灯、同位素氩(86)灯等十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这些发明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也填补了中国在光源研究上的许多空白。这可不是吹

在图式、笔墨、色彩诸方面,周矩敏平中求奇,小中见大,巧拙兼用,工写结合,繁简相宜,庄谐互补,意境交融。他笔下的人物男性五短身材,或蓄短须,或架近视镜,宽额、方鼻,精明而不失儒雅;女性则著旗袍、打花伞,移步款款,身材婀娜,是典型的江南淑女形象。人物的线描刚柔并济,长短相参,正侧顺逆,勾勒皴擦,变化多端。对水分的准确调度和控制产生了画面的空间感。画中色彩呈现出淡雅的苏州园林的魅力,鲜活地再现了那段流逝的岁月的时代特征。

寻诗多有谈空客

(中国画)周矩敏



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去美国,美国同行感慨地说:“现在我们美国使用的白炽灯基本上是从你们中国进口的,虽然白炽灯是爱迪生发明的!”更让我自豪的是,而今,全世界80%的节能灯在中国生产。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是当今世界第一产灯大国。说到我发明创造的成就,很多人夸我聪明,事实上科技发明并不是靠聪明,而是对技术的刻苦钻研的结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40年

生命不息研究不止

蔡祖泉

前,在研制“长弧氙灯”,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小太阳”时,玻璃和金属接口的地方必须要用能耐高温的银焊条,一时我们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买。我就回家里拿了块银元来,把它熔化掉,做成焊条来焊长弧氙灯的接口。

我们研制的灯用处是很大的。1968年以后,我和助手们接受了“651”卫星项目的任务,这就是将25千瓦水冷电极短弧氙灯,用作航天工业部大型空间环境模拟设备——太阳模拟器的光源,这种灯当时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生产,但我们却一举攻克了其中的困难,顺利地将军研制出来。这一研究成果

曾在航天工业部511试验站使用,1980年获得国防部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科技发展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只有执着追求的人,才能不断取得成就。上世纪80年代后,尽管我已年过50,但仍没有停止科研工作,相反,我工作劲头更足了。一方面,我积极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光源与照明的学术交流,多次出席国际性科技研讨会,了解国外电光源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及时将国际上的专业信息传至国内,指导我国光源照明的研究和开发。另一方面,针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成功研制新光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进行二次开发——工程化开发的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获国家科委推广二等奖。甚至在1992年退休后,我仍关心节能灯的推广工作,关心下一代技术人才的成长。

今天,我国的电光源照明技术和产品能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敢自豪地说,这其中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坚持不懈地追求科技创新是分不开的。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我想说,我要像他一样,生命不息,研究不止。

明日请看《角色虽变,发明激情依旧》